

詹文宏 李保平 鄧子平／主編

燕趙碑刻

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上冊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詹文宏 李保平 鄧子平／主編

燕趙碑刻

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上冊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燕趙碑刻·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全二冊／詹文宏、李保平、鄧子平主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01-09178-5

I. ①燕… II. ①詹… ②李… ③鄧… III. ①碑刻—
匯編—河北省—先秦時代 ②碑刻—匯編—河北省—秦漢時
代 ③碑刻—匯編—河北省—魏晉南北朝時代 IV. ①K87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34708 號

燕趙碑刻 (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主編：詹文宏 李保平 鄧子平

出版發行：天津人民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西康路 35 號 郵政編碼：300051

網址：<http://www.tjpmcs.com>

電子郵箱：tjpmcs@126.com

郵購部電話：(022) 23332469

出版人：黃沛

責任編輯：韓玉霞

特約編輯：王若濛

裝幀設計：[Logo] Book Design

印製：河北新華第一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版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3 月第 1 次

開型：889×1194 毫米 1/16

印張：64.5 印張 8 插頁

字數：1600 千字

定價：1080.00 元 (全二冊)

編委會

顧問 張群生 郭洪岐

主任 詹文宏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李保平 李須波 相金科 封宇星

郭慶華 張彥濤 梁松濤 鄧子平

鄭一民 謝飛

總策劃 李保平 謝飛

主編 詹文宏 李保平 鄧子平

編纂點校者（以姓氏筆畫為序）

李欣 李舒揚 宋忠報 谷圓圓

杜恩龍 武翰苑 超 孫亞蒙

倪斌 陳瑞清 徐占博 張幼平

張彩彬 張雅寧 梁松濤 楊永林

鄧文華 劉相美 劉雪彥

前言

◇ 詹文宏 李保平 鄧子平

人類跨入文明時代之後，作為文字載體之一的碑刻亦應運而生。其最早的誕生之地雖然不在中國，但中國却是世界上碑刻數量最多的國家。據相關文獻記載和近現代考古發現，我國的碑刻濫觴於商朝後期，發展於周秦西漢，鼎盛於東漢南北朝及隋唐，至今已有三千餘年的歷史。這些歷史悠久、質地堅實、形制多樣、文字形態各異、內容包羅萬象的碑刻，與我國古代的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一樣，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一道獨特、亮麗的風景，在數千年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留下了極其光輝燦爛的一頁。它既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實物見證，也是中華民族祖先留給子孫後代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

一

河北省別稱『燕趙』。燕趙碑刻是中國碑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碑刻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此，金石學家多有論述，現轉錄數則如下：

毛遠明在《碑刻文獻學通論》中說：『我國碑刻的分佈遍及全國各地，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有較大的地域差異。歷代碑銘以陝西、河南最多，山東、山西、河北亦富，隴蜀之碑也可觀。總體上說，北方碑刻多於南方。』〔一〕孟繁峰、劉超英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的《前言》中說：『燕趙大地的河北是中國出土墓誌的重要區域之一。諸如建國前出土的北魏定州之姚纂、安平之崔敬邕、南皮之刁遵等墓誌，東魏滄州之王僧，趙縣之李憲，磁縣之元寶建、元顯、元湛墓誌，北齊磁縣之司馬遵業、寶泰、泰妻婁黑女、高湜等墓誌，以及歸於遼寧省博物館（原瀋陽博物院）的『磁州八種』，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景縣六誌』，等等，無一不是聳聲於世的北朝名誌。』〔二〕馮賀軍在《龍興寺、萬佛寺與曲陽造像》一文中說：『曲陽白石造像以年代跨越時間長、具紀年發願文者數量多、題材新穎、石質潔白等特點著稱於世，並與成都萬佛寺、青州龍興寺鼎足而立，在定州乃至河北北魏晚期至盛唐佛教造像這一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居於主導地位，成為這一時期、這一地區代表性作品，並在中國寺院佛教造像史上佔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三〕馬无

咎則在《中國金石學概要》下編《歷代石刻》中說：『摩崖刻經以齊周爲盛，以山東、直隸（今河北省——引者注）、山西、河南爲最多。如泰安之泰山、徂徠山，鄒縣之尖山、小鐵山、葛山、岡山，磁縣之鼓山，遼縣之屋駮嶺，安陽之寶山，皆其最著者也。』^{（四）}

燕趙碑刻在中國碑刻史上赫赫有名，其地位僅次於陝西、河南，而與山東、山西二省相埒，這不是出自學者們的憑空論斷，而是由燕趙碑刻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縱觀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時期的碑刻，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問世時間早

一九三七年出土於平山縣三汲鄉前七汲村的《中山國刻石》，約刻於戰國時期中山王囂卒後至中山國爲趙國所滅之前（前三一〇—前二九六），不僅是河北省目前出土、發現的最早碑刻，亦是全國目前出土、發現的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它與唐代初年發現於今陝西寶雞市東北與鳳翔縣之南交界的南原西端的、迄今仍爲中國最早的文字刻石——戰國時代秦國的《石鼓文》齊名，同爲我國目前出土和發現的僅存的兩件先秦碑刻實物，被譽爲『中國碑刻之祖』。清道光年間發現於今永年縣北石口鄉吳莊村北朱山頂上的《群臣上醺刻石》，刻於西漢初趙王遂二十二年即文帝後元六年（前一五八），是河北繼《中山國刻石》之後問世較早的另一刻石文字，亦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漢代最早的刻石文字，被金石學家稱爲『漢石之冠』。

在『碑碣雲起』的東漢，刻於安帝（劉祐）元初四年（一一七）的元氏縣《祀三公山碑》（俗稱《大三公碑》），不僅是河北現存的十通漢碑中問世最早的一通，亦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問世最早的名漢碑之一。北朝皇帝喜愛刻石紀功，民國年間出土於今易縣西南畫貓兒村的《皇帝東巡之碑》（又稱《御射碑》），刻於北魏太延三年（四三七），記述了太武帝拓跋燾東巡過易州，與群臣比賽射箭之事。它比刻於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的著名碑刻《嘎仙洞祝文刻石》還早五年，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北魏第一通碑刻，稱它爲『魏碑第一』，該是恰如其分的。

墓誌又稱『埋銘』、『塋銘』、『塋誌』、『葬誌』、『墓誌銘』等，是一種埋在墓穴中、標識墓主身份的石刻。它萌芽於漢代，成熟於北朝。一九五二年春出土於望都縣所藥村的《東漢望都一號墓佚名墓銘》，書於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之前，是河北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方墓誌，亦是我國出土的爲數不多的東漢墓誌之一。清初至今，河北出土的北魏早期墓誌甚多，其中著名的有一九九三年出土於定興縣的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嚴德蚝墓誌》，一九九七年出土於趙縣的景明二年（五〇一）《趙謚墓誌》，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二年相繼出土於河間縣的延昌四年（五一五）《邢偉墓誌》、《邢巒墓誌》，清雍正年間（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出土於南皮縣的熙平二年（五一七）《刁遵墓誌》，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出土於安平縣的熙平二年《崔敬邕墓誌》等。

石經是中國古代刻於石版或石壁之上的經典著作。南北朝時，

爲了更好地保存、傳播佛教經典，佛教徒仿照儒家刻經的先例，鐫刻佛教經典於崖壁之上。據《唐邕寫經碑》記載，刻寫《維摩詰經》、《勝鬘經》、《字經》、《彌勒成佛經》等四部佛教經典於響堂山石窟，「起天統四年三月一日，盡武平二年，歲次壬辰五月廿八日」。它與刻於北齊乾明元年（五六〇）的河南安陽市善應鎮小南海鰲蓋山刻經，同爲目前所知我國現存最早的摩崖刻經。

顯而易見，燕趙地區是中國古代多種類型碑刻的最早問世地之一。

（二）存世數量多

燕趙碑刻向以數量衆多而聞名於世，但其具體數字，因至今尚未進行過全面統計，故很難有人說得清楚。據宋代以來的金石學著作、明清民國時期的河北省地方誌的著錄，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後發掘考古報告公佈的資料初步匡算，原石現存於世和原石已佚但有拓片流傳的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的碑刻，至少在千種以上，位於全國前列。其中被公佈爲省級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就多達二十餘種。本書收錄燕趙地區這一時期的碑刻，凡五百四十七種，約占總數的一半，亦已相當可觀。由於重視不夠、保護不力，燕趙地區這一時期出土與發現的碑刻，多有遭人毀壞、下落不明或流落省外乃至國外者。如一九五八年被人毀掉的《三公山神碑》、『文革』時被人毀掉的《淳于長夏承碑》等。不明去向的有《封龍山之頌碑》、《刁遵墓誌》等。現存於今遼寧省博物館的，有出土於磁

縣的東魏《元鸞墓誌》、《元鸞妃公孫甌生墓誌》、《張滿墓誌》、《侯海墓誌》、《蕭正表墓誌》，北齊《是連夫人邢阿光墓誌》、《梁伽耶墓誌》、《徐之才墓誌》等。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有出土於景縣的北魏《封魔奴墓誌》、東魏《封延之墓誌》、北齊《封子繪墓誌》等。現存於法國巴黎博物館的，有出土於涿縣的北魏《劉雄頭合四人造釋迦牟尼像記》、《高伏德合三人造釋迦像記》、《高洛周七十人等造釋迦像記》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令人感到十分遺憾和惋惜。當然，隨着時間的推移，燕趙地區還會有大量的碑刻陸續出土與發現，不斷增加河北的碑刻數量。

（三）分佈不均衡

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時期碑刻的出土與發現地點相對集中，明顯地呈現出地域分佈不均衡的特點。就河北全省而言，南部、中部數量較多，北部、東部則寥寥無幾。就河北南部、中部而言，西部又明顯多於東部。就河北各縣而言，刻石多集中於定縣（今定州市）、元氏縣、邯鄲市峰峰礦區等。其中定縣北莊子東漢中山簡王劉焉墓，一九五九年出土刻石多達一百七十四塊，現存於定州市石刻館。漢碑多集中於元氏縣，據文獻記載，元氏縣共有漢碑七通，至今原石仍存和原石雖佚但有拓本流傳的仍有五通。北朝碑碣多集中於磁縣、景縣，著名者有磁縣的《高盛碑》、《高翻碑》、《高肅碑》，景縣的《高慶碑》、《高貞碑》等。北朝墓誌多集中出土於臨漳縣、磁縣、臨城縣、高邑縣、平山縣、河間市、景縣

等。其中僅磁縣一縣，出土的北朝墓誌就多達數十方。造像記多集中於曲陽縣，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在縣城南關修德寺遺址共出土石造像兩千餘尊，上面刻有明確紀年並具發願文者多達二百七十一尊。其中有北朝造像一百七十六尊（北魏十四尊、東魏四十六尊、北齊一百一十六尊）。摩崖刻經則多集中於邯鄲市峰峰礦區、涉縣，這兩處摩崖刻經多達二十幾部，且有一部經文多達數萬字者。碑刻分佈的不均衡，不是人爲造成的，而是由各地區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所決定的。

（四）類型齊全

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碑刻類型齊全，可謂應有盡有。就碑刻本身的類型而言，除了刻石、碑碣、造像記、墓誌之外，還有石柱（如位於定興縣的北齊太寧二年《標異鄉義慈惠石柱》）、塔銘（如位於元氏縣的東魏元象二年《凝禪寺三級浮圖之碑頌》）、墓前（如出土於涿州市的北魏正始四年《張神洛買地券磚》）、摩崖刻經（如分別位於邯鄲市峰峰礦區及涉縣的北齊《響堂山摩崖刻經》、《娲皇宮摩崖刻經》）等。就碑刻質地而言，除了石質、磚質之外，還有陶質（如一九九三年出土於臨漳縣的東魏武定二年《趙受墓誌》）。就碑碣外部形態而言，既有有額無穿方首的《皇帝東巡之碑》，有額無穿圭首的《楊宣碑》、《高慶碑》、《高貞碑》、《高盛碑》，有額無穿圓首的《邸珍碑》，也有無額無穿的《祀三公山碑》、《封龍山之頌碑》，有額有穿圭首的《三公山神碑》、《三公之碑》，

有額無穿圓首的《白石神君碑》、《淳于長夏承碑》、《邸府君之碑》，既有豎立式的，也有臥式的《高叡、比丘僧刪修定國寺頌記碑》（俗稱《大定國寺碑》）；既有獨立的碑石，也有鑿在山崖上呈碑形的《唐邕寫經碑》、《古中皇山碑》。就碑刻書體而言，除了隸書、楷書之外，也有用篆書鐫刻的《中山國刻石》、《群臣上齋刻石》，還有《祀三公山碑》這種篆隸相兼、被金石學界稱爲『繆篆』的書體；碑額、誌蓋的書體，除了篆書之外，也有使用楷書的《楊宣碑》、《魏故司空公李君之銘》、《王僧墓誌》、《房蘭和墓記》等。就碑刻刻寫方式而言，除了用刀鐫刻之外，也有用墨筆書寫而未刻的《東漢望都一號墓佚名墓銘》、西晉的《馮恭石桴題字》、北齊的《元羽妻鄭始容墓誌》等。就鐫刻文字的順序而言，除了右行豎書者外，也有左行豎書的北齊的《劉白仁造菩薩像記》、《十六佛名刻石》；除了刻於底座前後左右的造像記外，還有按順時針方向，由外向內、自右向左環刻於方形底座之上的北魏的《僧暈造弥勒像二菩薩記》。就碑刻的文字多少而言，除了一字、數字、十幾字、數十字者之外，還有長達兩千餘言的東魏元象三年的《李憲墓誌》、長達三千四百餘言的《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長達三萬兩千餘言的《〈深密解脫經〉摩崖》。就碑刻署名而言，除了未署撰書者、雕刻者姓名之外，也有標明撰文者姓名的《讚三寶福寺碑》、《元鷲墓誌》、《封子繪墓誌》、《元洪敬墓誌》、《袁月璣墓誌》等，標明書丹者姓名的《三公山神碑》、《皇帝東巡之碑》等，標明鐫刻者姓名的《封龍山之頌碑》。就碑刻的內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

包羅萬象。如此齊全的碑刻類型，在全國各省中亦屬罕見，不能不說是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碑刻的又一特點。

（五）文獻價值高，對後世影響大

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碑刻的文獻價值極高，對後世人文科學特別是書法、篆刻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現舉數例，以見一斑。

如前所述，位於元氏縣、刻於東漢元初四年的《祀三公山碑》，是河北目前發現的漢碑中刻立年代最早的一通，亦是全國著名的漢碑之一。它完整地記述了隴西馮君擔任常山相之後，面對羌寇入侵、蝗旱鬲并、百姓流離失所的局面，率衆在三公山起堂立壇，薦牲納禮，祈求三公山神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經過，真實地反映了東漢王朝中期民不聊生的歷史事實和崇尚神靈的社會風尚。該碑「以隸勢作篆」，篆隸交融，行次規整而橫行參差錯落，書風蒼古遒勁，用筆汪洋恣肆，在漢碑中獨樹一幟，別開生面，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碑刻創作，而且成爲有清以來諸多書法、篆刻大家取法和師承的重要對象。清代楊守敬在《平碑記》中評此碑云：「非篆非隸，蓋兼二體而爲之。至其純古遒厚，更不待言，鄧完白篆書多從此出，其鐫刻私印，則純效其體。」這也就是說，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之所以能獨領書壇風騷，開創篆書新貌，顯然受到《祀三公山碑》的深刻啓發。以古拙蒼勁、奇逸豪邁的書風著稱於現代書壇的齊白石，無論在作品的章法上，還是在文字的結體上，亦受益於《祀三

公山碑》。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刻印，最早是走丁龍泓、黃小松一路，繼得《二金蝶堂印譜》，及專攻趙搗叔筆意。後見《天發神讖碑》，刀法一變。又見《三公山碑》，筆法也爲之一變。最後喜秦權，縱橫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變。」

清康熙十八年出土於安平縣、刻於北魏熙平二年的《崔敬邕墓誌》，是河北出土較早的一方北魏早期墓誌，亦是享譽全國的北魏名誌，被推爲「北朝誌石之冠」。它記述了崔敬邕的籍貫、家世、生平業績、生卒年月等，可補正史記載之缺，糾正史記載之誤。該墓誌雖未署書丹者姓名，但其書法意象開闊，落落自得，筆致蘊藉，妙趣橫生，代表了當時河北乃至全國的最高書法水平。出土之後，即好評如潮，贊聲不斷，有力地助推了清代以來的書法創新。正如康有爲在評此墓誌時所說：「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爲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於《崔敬邕》也。」^{〔五〕}這裏的「懷寧」，指清代著名書法家、篆刻家鄧石如，因鄧石如是安徽懷寧人，故以此稱。《標異鄉義慈惠石柱》，規模高大宏偉，雕刻精美絕倫，是河北現存的十分難得的北朝建築藝術佳作。它以洋洋三千四百餘言的篇幅，詳細記述了北魏孝昌年間（五二五—五二七）的杜洛周、葛榮起義以及起義失敗後當地義葬、義食、義堂的情況和興建石柱的背景、過程、意義等，對考察當時的社會現實特別是基層社會的慈善組織及其活動極具史料價值，對推進北朝史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位於邯鄲市峰峰礦區北響堂寺石窟、刻於北齊武平三年的《唐邕寫經碑》是北齊名碑之一。它詳細地記述了唐邕在北響堂寺石窟鐫刻佛經的背景、時間、經過及意義等。該碑書體隸楷雜糅，結構平穩，意態溫雅，筆意淳古，氣魄渾厚，具有極高的書法價值。現已成為研究北齊摩崖刻經及當時人們思想觀念的重要史料。

其他碑刻如碑文遒勁工整、架勢莊重的《高盛碑》，字形方正、凝重厚實的《高叡、比丘僧櫟修定國寺碑》，實開隋唐楷書特別是顏體書法之先河。碑文易方為長、骨力挺拔的《凝禪寺三級浮圖之碑頌》，對清代張裕釗南宮碑體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高貞碑》、《高盛碑》、《高肅碑》、《元誕墓誌》、《元湛墓誌》、《元顯墓誌》等北朝墓碑、墓誌，《堯峻墓誌》、《堯峻妻吐谷渾靜媚墓誌》、《堯峻妻獨孤思男墓誌》、《茹茹公主墓誌》等一些鮮卑人的墓誌，已成為研究北朝史特別是北朝宮廷史、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融合史的重要實物見證。

要而言之，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碑刻，歷史悠久，數量巨大，類型齊全，內容豐富，是研究河北古代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傳世文獻所不能替代的價值，值得人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充分利用。

二

燕趙地區如此衆多且聲名顯赫的碑刻，是由燕趙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種因素造成的。現試析如下：

（一）獨特的地理環境

燕趙地處華北，東瀕渤海，西倚太行，南臨漳河，北枕內蒙古高原，西北高而東南低，是全國少有的集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地貌於一身的省份。這樣的地形、地貌，再加上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條件，造成了河北獨特的地理環境。

正是這樣獨特的地理環境，才催生了距今約二百萬年的舊石器時代的泥河灣遺址，以及距今七千三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磁山文化遺址，才保留了『阪泉之戰』、『涿鹿之戰』這樣一些關於黃帝、炎帝、蚩尤的古老傳說等，使河北不僅成為中華文明最早的發祥地之一，也成為『東方古人的文化搖籃』。正是這樣獨特的地理環境，才使河北成為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並生並存又相互沖突與融合的地區。戰國至南北朝時期，這裏既建立了許多漢族政權，如戰國時代都於薊（今北京市）、以武陽（在今易縣）為下都的燕國，以邯鄲為都城的趙國，初都於順（在今定州市）、後徙都靈壽（在今平山縣三汲鄉）的中山國等。也建立了不少少數民族政權，如羯族首領石勒建立的初都於襄國（在今邢臺市西南）、後都於鄴（今臨漳縣鄴鎮）的後趙，鮮卑慕容部建立的相繼以中山（在今定州市）、鄴為都城的前燕、後燕等。此外，還有鮮卑化漢人高歡、高洋建立的以鄴為都城的北齊。正是這樣獨特的地理環境，才造成了河北中部及南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較為發達，碑刻創作繁榮昌盛，而北部及東部則相對落後，碑刻數

量屈指可數的局面。總之，生活在這裏的勤勞、智慧、勇敢的先民們，在漁獵耕作、繁衍生息的同时，也用自己的雙手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爲我們留下了豐厚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這其中就包括數量衆多、質量一流的碑刻。倘若平山縣三汲鄉不位於當時中山國都城附近，恐怕很難有《中山國刻石》在此發現；倘若元氏縣不是當時常山國治所在地，恐怕很難有七通東漢碑碣於此問世；倘若磁縣不鄰近當時東魏、北齊的都城鄴，恐怕很難有近百種墓碑、墓誌在此發現與出土；倘若響堂山石窟、娲皇宮石窟不鄰近都城鄴並位於北齊兩大政治中心鄴城與太原往來的沿途要道上，且未得到北齊朝廷的鼎力支持，那麼規模如此恢弘、文字如此多的摩崖刻經，恐怕很難實施與完成。這是因爲碑刻創作的興旺發達與否，與該地所處的政治地位、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二）敬祖追迹、留名後世的社會風俗

人亡追迹，留名後世，向爲古人所重，並漸漸演變爲一種社會風俗。人亡之後，人們在悲痛悼念的同时，擔心亡者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其姓名與業績將湮沒無聞，以致後世未詳其名，來世不記其德，於是把書有亡者姓名、籍貫、世系、生卒年月、生平業績、褒揚亡者功德的文字，鐫刻於貞石之上，埋在墓中或立於墓前，以達到「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目的。正如收入本書的《堯峻墓誌》的誌文所云：「『不封不樹，恐懋績與寒暑同湮；無記無銘，慮洪名將風塵共盡。敬鐫玄石，用表前修；題美窮泉，方傳後裔。』」上至

皇室貴戚、士族官宦，下至平民百姓、僧尼道士，莫不把墓碑、墓誌作爲喪葬中一種重要的祔葬品。正是這種敬祖追迹、留名後世的社會風俗，爲後人遺存下來數量龐大、刻制精美、內容豐富的墓碑、墓誌，提供了瞭解和研究古人極其寶貴的資料。人們可藉此補正史之缺，詳正史之略，糾正史之誤，從而把古代歷史研究特別是古代歷史人物研究不斷地推向深入。

（三）士族門閥的集中聚居

士族門閥制度，形成於東漢，全盛於南北朝，隋唐時逐步衰落。士族亦稱「世族」，是由東漢的大姓豪族發展演變而成的。門閥即「門第閥閱」，亦稱「高門」，指世代顯貴之家。這些士族門閥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享有特權，世代官高爵顯，且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變。其共同的文化特徵是詩書繼世、忠孝傳家，特別注重郡望、門第、流品，不與庶族寒門通婚、往來。崇尚厚葬，往往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爲死者造棺築墓、鐫刻碑誌，以顯示豪門的尊貴和榮耀。

自漢魏至隋唐，河北一直是士族門閥的集中聚居地。范陽（今涿州市）盧氏，清河、博陵（今安平縣）崔氏，趙郡李氏，脩縣（今景縣）高氏、封氏，河間邢氏，無極甄氏等，都是聲名極其顯赫的士族門閥。其中的盧、崔、李三氏，更是冠於河南滎陽鄭氏、山東琅琊（今臨沂市）王氏之前的頭等士族門閥。因爲這些士族門閥一直保持着葬歸族地的習俗，所以爲河北留下了數量可觀、質量上乘的墓碑、墓誌。其中著名者甚多，例如《盧君墓誌》、《崔敬邕墓

誌》、《崔景播墓誌》、《李希宗墓誌》、《李君穎墓誌》、《邢繼墓誌》、《邢偉墓誌》、《甄凱石志》、《高貞碑》、《高慶碑》、《高湛墓誌》、《封龍墓誌》、《封延之墓誌》及「磁縣三高」等。

(四) 佛教的傳入與興盛

佛教傳入燕趙大地的具體時間，雖尚無定論，但是，從地上現存和地下出土的實物來看，至遲在東漢的中後期，它已經傳播到河北中部、南部。

佛教進入燕趙地區之後，由於諸多因素的交織作用，得以迅速廣泛的傳播，至東魏、北齊達到鼎盛。據文獻記載，北齊王朝曾把佛教奉為國教，極力宣揚和提倡。其時全國有佛寺四萬所，僧尼二百萬以上，幾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首都鄴城，更是寺院如林，名僧雲集，信徒眾多，佛教的發展繁榮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河北乃至北方的佛教中心。唐代道宣在《續高僧傳》卷十《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高傳》云：「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其時佛教興盛之景象，由此可見一斑。

佛教在燕趙之地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呈現出如下幾個明顯的特徵：一是得到了東魏、北齊朝廷的倡揚與扶持，皇帝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二是趨於世俗化，開始與普通民衆的思維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相融合，構成民衆的風俗習慣。三是上至皇室權貴，下至平民百姓，悉熱衷於修建寺院、開鑿石窟、刻經造像等功德，

以此寄託自己美好的願望，慰藉自己受傷的心靈。正因為如此，才在燕趙大地上留下了規模宏大的響堂山石窟、渦皇宮石窟及摩崖刻經，以及數以百計的造像記，它們不僅成為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碑刻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而且成為研究北朝摩崖刻經、造像記珍貴的實物資料。

三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着國家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碑刻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保護，碑刻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出版也進入了歷史上的黃金期。然而，令人略感遺憾的是，河北碑刻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出版雖然也取得了明顯的業績，但與其他碑刻大省相比，無論是重視程度還是出書的規模、數量都相形見绌。縱覽河北已經出版的碑刻文獻整理著作，其或囿於某一碑刻種類，或囿於一市一縣，或僅有拓片、介紹而無錄文，或僅有錄文而無拓片、介紹，至今尚無一種收錄燕趙地區先秦至南北朝各種類型碑刻，集拓本、介紹、錄文於一體的碑刻文獻整理著作問世。這既與河北作為碑刻大省的地位極不相稱，也勢必影響燕趙碑刻文獻充分地利用。

令人欣幸的是，二〇一〇年春，經時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副司長王然同志友情提示，我們在作了相關調研、論證之後，動議編纂旨在反映河北碑刻全貌的《燕趙碑刻》一書，計劃分為《先

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宋遼金元卷》、《明清卷》陸續推出。該書已被列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其中的《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也被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河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對本書的編纂出版高度重視，將之列為河北省歷史文化建設項目，進行多方面的協調指導，申報並取得了省財政的專項資金支持，從而解決了本書出版的資金難題。

四

『事非經過不知難。』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我們逐漸真正認識到本書編纂的難度超乎想象，不僅資料搜集難、拓本真偽鑒別難、介紹文字撰寫難，而且碑文的識讀更是難乎其難。

爲了排除困難，少走彎路，我們採取了許多措施。如利用各種手段，通過多個渠道，廣泛了解信息，大量搜集資料，然後再加以整理、分析，充分吸收前賢時哲已經取得的燕趙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成果。再如按照國家現行的語言文字規範標準，根據古籍整理的通則，我們經過反復討論，認真制訂了本書編纂整理的原則和標準，就全書的編纂體例，收錄範圍、內容，以及標題的擬訂、簡介的撰寫、拓本的選擇、編排的順序、文字的使用等，作出了詳細的規定，

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並貫徹於編纂整理的全過程。例如對拓本選擇所提的要求，既符合拓本流傳的實際情況，又保證了拓本的質量。再如對錄文文字使用所作的規定，既符合國家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和古籍整理對文字使用的要求，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碑刻用字的面貌，能讓人們看出文字『競趨簡易』、『於人便利』的發展演變規律。這樣一來，極大地方便了參編人員的操作，確保了全書的整理進度和質量。

本書的編纂得到中國國家圖書館、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金石學會、邯鄲市博物館、河間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磁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涉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等單位以及許多碑帖收藏者的大力支持。他們提供了上百種未曾公佈的拓本供本書使用。河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特別聘請碑刻文獻整理專家通審了全部書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所有這些，對減少本書錯誤、提高本書質量都大有裨益。

本書的編纂，自搜集資料至稿件完成，歷經數個寒暑。這期間雖不遺餘力，勤勉有加，但終因才疏學淺，不免疏誤，誠請方家不吝垂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注釋：

〔一〕毛遠明著：《碑刻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第十七頁。

〔二〕孟繁峰、劉超英主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第一頁。

〔三〕馮賀軍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五

年九月，第一三八頁。

〔四〕馬无咎著：《中國金石學概要》，臺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八年四月，第三七頁。

〔五〕康有爲著、崔爾平校注：《廣藝舟雙楫注》，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三二—三三頁。

凡例

一、本書根據所收碑刻的性質，依次分爲刻石、碑碣、造像記、墓誌、石柱、摩崖刻經六編，共收錄今河北省區域內已出土與發現的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鐫刻的、已經公佈與未曾公佈的碑刻五百四十七種。

二、本書所收碑刻，以原石現存且有拓本、照片流傳者，原石雖存但拓本、照片未曾公佈者，以及原石雖佚但有拓本、照片流傳者爲主。雖存有原石，但泐蝕殘損嚴重而無法辨識者，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不予收錄。碑刻出土、發現時間的下限，截至二〇〇三年。

三、本書每編之內所收碑刻，均按鐫刻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

紀年採用皇帝年號紀年並用圓括號加注公元紀年之方式。有年有月而無日者，排在本年本月之後，有年而無月無日者，排在本年之後；個別可以確定朝代而無具體年份者，排在同朝代之後。少數碑刻所載年號和具體時間，與實際情況不相吻合者，仍以碑刻所載年號和時間爲序，但在簡介中加以說明。依現拓片已無法確定時間者，採用前人整理成果所確定的時間。

四、本書所收每種碑刻，均由標題、拓本、簡介、錄文四個部分組成。

五、標題視每種碑刻的具體情況而定。碑碣、墓誌、石柱，凡有碑額、誌蓋、柱額者，均以碑額、誌蓋、柱額的文字作爲標題；無碑額、誌蓋而有首題者，以首題作爲標題。摩崖刻經以所刻經名作爲標題。碑額、誌蓋、首題皆無的碑碣、墓誌，以及刻石、造像記等，則根據每種碑刻的內容，或沿用原來的名稱，或自行擬定標題。每一標題之下，標注鐫刻時間。

六、在廣泛搜集碑刻拓本、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編者經過反復比對，盡量使用原石早期捶拓、頁面完整、文字清晰的拓本。

個別原石已佚且無拓本流傳的碑碣，則使用重刻的拓本。個別原石已佚且無完整拓本流傳的碑刻，則使用剪裱本。

七、根據每種碑刻的具體情況，簡明扼要地介紹該碑刻的其他名稱，鐫刻時間，出土時間、地點，現藏地點，形制，尺寸，質地，主要內容，行數，字數，書體，紋飾，撰文、書丹及鐫刻者姓名，

價值，以及公佈、流傳、著錄情況等，以方便讀者瞭解該碑刻的基本信息。因限於資料，有些碑刻僅介紹其中的幾項。

八、本書採用繁體豎排的方式。錄文悉據碑刻原文，加新式標點符號，並根據內容適當分段。現拓片已缺失或無法辨識的文字，均依前人碑刻文獻輯錄成果予以補充。按照國家語言文字規範標準和古籍整理通例，將錄文中的異體字、俗體字等，多改爲通行的正體字；舊字形均改爲新字形；對一些因形體相似、讀音相同或相近而造成的錯別字，則根據上下文意徑改，不予標示；對古體字、假借字、同義字、簡化字等，則予以保留，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碑刻的

用字風貌。改正碑刻中的訛字、錯誤詞語，用「〔 〕」標示；增補碑刻中的脫字，用「〔 〕」標示；刪除碑刻中的衍字，用「〈 〉」標示；改正碑刻中的倒字，用「【 】」標示。對泐蝕殘損嚴重、無法辨識的文字，凡數量較少且明其字數者，均以「□」代替，一字一「□」；凡數量較多且不明字數者，分別以「（下缺）」、「（下泐）」、「（上缺）」字樣標示；凡根據上下文或其他文獻增補的文字，在字上加「□」標示。爲節省篇幅，原碑刻中無意義的空格、空行等均未予保留。

總目錄

第一編 刻石	一
第二編 碑碣	一三九
第三編 造像記	二一三
第四編 墓誌	四六七
第五編 石柱	八八〇
第六編 摩崖刻經	八九七
參考文獻	九六八